

笔会

我最钦佩的「望月人」

詹克明

为此他得出太阳直径要比月亮直径大 20 倍（实际上也是 400 倍）。不仅如此，阿里斯塔克在观察月食时，发现此时地球恰好完全遮住太阳，并据此估算出月球半径约是地球的一半（实际应是四分之一）。由此，他得出日、地、月三者直径之比为 20:2:1（实际应是 400:4:1），也就是说太阳直径是地球直径的 10 倍（实际为 100 倍）。

即使按照他所得出的太阳只比地球大 10 倍，这也是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太阳比地球小得可怜，它只有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么大（面积仅 2.1 万平方公里）。据此，阿里斯塔克得出更为惊世骇俗的推论——太阳并不围绕着地球转动！在阿里斯塔克看来，既然太阳直径比地球大 10 倍，太阳就不可能绕着一个体积、重量只有自己千分之一的地球旋转，唯一的结论只能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转！

仅仅望望月亮，就能算出“地-日”与“月-日”的距离之比，得出太阳、地球、月球的直径之比，甚至横空出世创立了“日心说”的宇宙观。

普天之下那么多望月人，又都懂这点浅显数学，却只有阿里斯塔克在望月之时，顺手把太阳、地球、月亮关系做了重新安排。在人类文明史上，仅对“望月”而言，他凭什么如此独一无二地成为千古一人？答曰：凭的就是他那独具只眼的思想悟性！

有句名言：“凡是真正的美都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同样，最伟大的科学也不是用金钱就能堆得起来的。哪怕科研经费十亿百亿，超大型仪器世界级，教授“博导”如过江之鲫，研究生多如河滩卵石，缺少了学术上的奇绝独见，就很难做出当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创立伟大科学首要的是：必须具备超越绝伦的独特见识。这与“钱”绝对无关，更不靠兵多将广，有时只要一个头脑就够了。屈原对渔父说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有时科学发展到当口，举世都处在迷惑不解之时，确实需要一位独步当代之人出乎意外地提出一个全新观念，创立一种崭新理论，从而使科学突破隘口，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里关键的是“全新的思想”与“独到的见识”，它们来自于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与非凡的想象力。

与阿里斯塔克颇为相似的还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公爵德布罗意，他在博士毕业论文中提出的“物质波”观念。其实这纯粹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他认为：既然光波有“粒子性”，那么反过来微观粒子也应该具有“波动性”，为此他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德布罗意波”概念。受这个概念的影响，薛定谔创建了著名的“量子力学波动方程”。幸运的是，三年后的 1927 年，美国的戴维森和革末以及英国的 G.P.汤姆孙几位年轻科学家，通过电子衍射实验各自独立地证实了“电子确实具有波动性”。“物质波”的存在这么快就得到证实，使德布罗意获得了 192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 27 岁。

其实德布罗意学习物理总共也没几年（此前先得了个文学学士，后才转行物理，又当了 6 年兵），也无需做什么事，又没花什么钱，尤其是没用大型仪器，没做繁琐公式推导，更没有进行复杂的数学计算，仅仅凭着一种独特理念就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几乎都来自于独特的科学理念。例如魏格纳，生病卧床时闲看墙上的世界地图，发现非洲西海岸与南美洲东海岸两者的海岸线如此之契合，几乎可以“拼合”起来，故在 1912 年大胆提出了“大陆漂流学说”（此学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基于实验测量的“板块构造理论”所证实）。门捷列夫像玩纸牌似的把每个元素的性质都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几经排布变换，居然排出了“化学元素周期表”。再比如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C₆₀ 球形分子的发现，研究者都是突然悟出了一种独特的分子链接方式才最终破解了这些特殊分子的结构之谜。当然，科学史上最具颠覆性的突破当属 20 世纪初的两个最独特理念：普朗克提出“能量不连续”观念创立了“量子论”；爱因斯坦提出“光速不变”观念创立了“相对论”。

如是观之，开创新科学终究还是要靠独出心裁的全新思想。有此思想，就能树起一座“擎天柱”，撑起一片科学新天地。若总是缺少孕育新思想的沃土，旷世大才羁缚难出，就只能叨陪末座。“矮科学”，投入再多也没用。

在科学上，有时一个伟大的思想能胜过 10 所大学、100 名院士、1000 名教授，再加 1 万名研究生（这些我们仅仅一个省就都能凑够）。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生活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迁徙；一些书物，有的丢失了，有的一时找不到了。这次，偶然翻书，竟找到了巴金先生于七十年代的四封来信，一时的欣喜，自不待言。

巴金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作家，也是我阅读生活中，最早接触和受到影响的一位新文学作家。小时候，在我故乡——江南小城镇狮子林的那座老屋里，我能读到的，就是一本本尘封着的桦铁桦编的《小说月报》、赵苕狂编的《红玫瑰》、王钝桦编的《礼拜六》、周瘦鹃编的《紫罗兰》；以后，能够找得到的，也仍然是《彭公案》《施公案》《永庆升平》之类的小说。时间久了，对于鸳鸯蝴蝶才子佳人，对于英雄豪杰的劫富济贫，不免产生了厌倦。我们就读的晏成中学附属小学，原是教会办的，是一所新型的朝气蓬勃的学校。一天放学回家，只见姊姊捧了一本厚厚的书，放下书包，就读了起来。几天以后，我也挤着时间，大家轮流着读。这就是那一本巴金的名著，“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

在这本书里，巴金所刻画的人物，所安排的情节，想不到，对我们是如此的熟悉。这个“家”，应该就是旧中国千千万万个的一个缩影。它受欢迎是如此的热烈，也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

看完了《家》，一时无法借到《春》，只能把别人才看完的一本《秋》借来先读。仅仅看了几个章节，就被书中人物苦难的命运所感动。说来好笑，忍不住还掉了眼泪，一时为小伙伴传为笑谈。后来知道，巴金早就宣告过：“生活现实使我痛苦。”又说过，他就是“流着泪，写完了这本书的”。作家写书的目的，不就是要通过他笔下的故事，感动读者，要让千万读者像他一样，懂得爱，懂得恨吗？我琢磨到了这点，一些笑谈，尽可坦然处之。

看完了《激流三部曲》之后，在临近小学毕业前夕，我以我的家为雏形，也动手写了一篇题名“骆驼”的习作，顺利刊登在四十年代初《苏报》的副刊上。得到稿费，又兴冲冲向上海开明书店邮购到了巴金另一长篇《爱情的三部曲》。翻开书页，一个人物的一句话“人生就是奋斗，生活只有前进”，闪耀在我的眼前，深深吸引了我。从此，这句话，似乎镌刻在我的心上。它陪伴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度过了异常艰难的青少年时代……岁月悠悠，一晃，七八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文革”结束后，我和一些师友们的往来陆续恢复。而在略早些时，我在苏州九如巷张家见到了沈从文，在他处住了两个半天。临别时，沈从文写了给巴金的信，要我返回上海后寄给他。他牵挂着老友在萧珊逝去后的生活……他们的心是连在一块的。他再三嘱咐我，要多去看看巴金。由此，我和巴金开始了往来。

巴金寄我的四封信，现抄录在下面：一、1976 年 2 月 20 日（图①）

香还同志：来信收到。从文处我上月中旬去过信，还没有得到回音，可能他还在苏州。

鲁迅先生日记中讲到的“南京饭店吃饭”，是 1934 年 10 月的事情，我那年十一月去日本，先生和一些朋友在南京饭店替我饯行，保宗就是茅



① 巴金 二月二十日

盾先生。匆匆覆。祝好！

巴金 廿日

二、1977 年 1 月 17 日（图②）

香还同志：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文章我不曾写。没有报刊的人来组织我写，写了也不可能发表。想写文章的人太多，而发表文章的地方又太少，这个矛盾一时也难以解决。从文至今无信来，可能他仍在苏州。

匆匆覆。祝好！

蒂甘 廿七日

三、1977 年 4 月 1 日

香还同志：信收到。我的旧作的目录勉强给您补全了，不过没有整理，一时也注不出写作和出版的时间，请原谅。将来或者可以找一份别人过去搞的目录寄给您，但目前还无办法。

从文一直没有来信，不知道他回家后情况怎样？病是否已经完全好了？匆匆覆。祝好！

蒂甘 四月一日

《灭亡》、《新生》、《家》、《春》、《秋》

《雾》、《雨》、《电》（爱情的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将军》、《憩园》、《第四病室》、《神、鬼、人》

《长生塔》、《巴金短篇小说一集、二集、三集》

《小人小事》、《怀念》

《旅途随笔》、《海行杂记》、《短筒》

《火》（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寒夜》

短篇：《复仇》、《光明》、《电椅》、《沉默》、《沉落》

散文：《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梦与醉》、《点滴》

短篇：《发的故事》、《还魂草》、《生之忏悔》、《龙·虎·狗》、《静夜的悲剧》

杂文：《无题》、《感想》、《控诉》

解放后写的：《大欢乐的日子》、《新声集》、《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

《慰问信及其他》、《华沙城的节日》、《英雄的故事》（短篇）、《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谈契诃夫》、《大寨行》、《友谊集》、《李大海》（短篇）

《贤良桥畔》、《明珠和玉姬》（短篇）

（按：黑体字篇目，为巴金先生添加——作者）

四、1978 年 11 月 22 日

香还同志：谢谢您转来的从文的信，我已把回信寄到苏州了，好些时候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正惦念着他。

柯灵住在我家附近，他现在在电影局群众文工团（？）工作，大概下午休息。他的身体还不错。

我平时下午在家，很少出去，（除了偶尔参加大会外）。要来暂时都行，当然欢迎。

匆匆覆。祝好。

巴金 廿二日

巴老写这几封信的时间，实际上离他被批斗、污蔑之为“黑老 K”的那一长串黑暗日子并没有多久，身心伤害更无法一时消除。在这样的时刻，把老朋友对他的惦念告诉他，或许可以让他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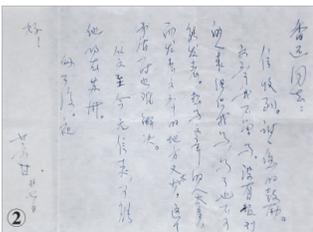
关于这几封信，也仍得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其一，过去读《鲁迅日记》，有关鲁迅先生 1934 年 10 月 6 日在南京路饭店店作的事，是《鲁迅日记》有关巴金的仅见的记载。“夜半钱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同去，全席八人”。为巴金东渡学日文，鲁迅先生竟特此邀请多人送行。这是非同寻常的友爱的体现，似可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后来，巴金在鲁迅先生丧礼中，扶柩执绋，也就是情理中必然的事了。

其二，当初写这封信，其实是出于于我的忽然想到。巴金回信写出了特殊环境中，他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其三，巴金作品目录，是我在

巴金的四封信

张香还



② 巴金 四月一日

那一年，在得到巴金信后，我就去了武康路 113 号，看望巴金先生。

那天是初冬下午，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来到门前，但见门庭冷落，甚至荒凉而空寂。巴老亲自开了门，引领着我，走进那间原是会客室的屋子。只见一张卧榻，横置中央。旁边桌子上，有一个镜框，置放着萧珊的遗像。在阴暗的光线中，只见周围局促又凌乱。

他招呼我，在屋边两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只要面对面相处，就会在默契中，自然地感到，他是那么和蔼，那么真诚，那么热情。我面对着的那么会把心掏出来的人，因此，初时的那种隔膜、那种拘束，很快就消失了。

打开话匣，他就提到了沈从文。他很惦记沈从文的近况。慢慢地，他就开始和我述说他与沈从文心相印的交往。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沈从文和张兆和新婚不久，就邀请他去青岛相聚。对他来说，这是一段极为欢畅、不易忘记的日子。在青岛，他一边忙于各人的写作，一边又在闲着的时

候，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他提到了年轻时，也就是 1934 年那次东渡日本的事。鲁迅先生举办的宴席，出席的还有黄源、叶圣陶等几个人。这是他第一次赴日。他喜欢日本文学，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甚为欣赏。他在东京、横滨仅仅耽了几个月；第二年，溥仪访问东京时，几个警察突然闯进了他的居住地；他被带到了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由此，就离日返国。以后他再也提不起学习日文的热情……

他提到了他那篇写于朝鲜战场上的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我告诉他，我是在“五次战役”以后，紧接着的“金城阻击战”的坑道中读到它的。描写我军高级军事干部，如此生动、形象、真实的作品，似乎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没有哪一篇可以超越它，读了使人难忘。巴金告诉我，彭总是个谦虚、诚恳、亲切的人。当初写毕，初稿曾请彭总看过。彭总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要求很苛刻，对文章提出了意见，删掉了一些内容。巴金说，写这篇作品时，他为全新的战地生活所鼓舞，当时的心是激动的，但执笔却很轻松，一挥而就。

他提到了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以及散文作家也是他朋友的李广田、陆蠡、缪崇群等人，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很好的，有自己的文采，自己的风格。他称扬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孤岛时期”被日本宪兵杀害的陆蠡，他的散文蕴藉、凝重，死时年仅三十四岁。他的心灵是崇高的……

好几年后，记不清为什么事了，我又去拜访巴金。走进巴金那间卧室兼会客室的时候，他在床上垫被一角，翻出了一个纸包，交到了我的手中。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两本书：一本是当年巴金主编，作为《文学丛刊》第一集之一的沈从文的《八骏图》，米色麻布面精装本；另一本则是《文学丛刊》第二集之一，巴金自己的作品《忆》，蓝色布面，红色题名的精装本。《文学丛刊》用此蓝色布面精装，似较少见。在本书扉页，巴老又题着几个字：

香还同志：化成泥土，为前进者暖脚

巴金 八六·五·一四

这似乎是他对我的希望，更是对他自己的要求。如此光彩夺目的语句，却不是人人都能写出，都能做到的，只有他。这位称赞过陆蠡是具有“崇高心灵”的人，他自己不也是具有如此“崇高心灵”的人么？！

他给我寄来的，他的一本本新出版的作品，依然放置在我的书架上，他用以投邮装书本的封袋——那上边有他一笔亲手写上的地址、收件人姓名以及作为投寄者的他的姓名——我也依然存放在那里。我不忍随意丢弃。这都体现了他们的深情厚谊。

这一切，我都从心里感激他！虽然，他去世，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2016 年岁暮，上海忆润苑

笔会

春雨过后（国画） 钟增亚



林译本《伊索寓言》：“村姑戴牛乳一器过市，沉思售乳得资，可易鸡子三百，伏之，即赚五十，犹得二百五十维也。既项，尽粥之，向岁可得巨金，用以裁衣，被之招摇过市，群少年必乞婚于我，我必尽拒以恣吾择。思极而摇其首，首动，器覆于地，乳乃尽泻。于是万象皆灭。”（见《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135 页）

明江盈科《雪涛小说》“安心”条：“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

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

金。我以十金易五特，特复生特，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特所生者，又复生特，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举责（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童仆，买小妻，我乃与尔优游以终余年，不亦快乎？’妻闻欲买小妻，佛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

按，此二事之相类，近人已考论过。最早徵引《雪涛小说》此事的，

为郑振铎，见其《中国文学论集》；最早将之与《伊索寓言》提置一处的，则为刘成斯，见其《文学述林》卷三。后来季羨林作《一个故事的演变》（见《季羨林全集》第 17 册），又追溯其源，以为中国文献中的这一故事，是从印度传来，梵文古书《嘉言集》之《和平篇》第七个故事、《五卷书》第七个故事，皆是。据季文从《梅岭诗话》转引东坡诗注，知其未睹刘书。

其实，《庄子·齐物论》早云：“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鸢炙。”所以，即认《雪涛小说》的故事，是从《庄子》敷衍而出的，亦无可不可。

尤为可笑的，则是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三所载的一条，为诸家之所未及：“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此已非寓言，而是人间的真实事了。只是，那位新县令是否读过《庄子》、《五卷书》，受了它的启发，才这么干的，我无从得知，不敢乱说了。

“大早计”

王培军

王培军

王培军

王培军